與潘銘燊閒話家常

■盧因

潘銘燊（左）和本文作者

潘銘燊辭掉香港中文大學教授職位，移居溫哥華倏忽一載有多。我雖然和他認識不深，算來也兩年左右，但一見如故，大家很談得攏。他是芝加哥寒窗苦讀的名牌大學博士，《紅樓夢》研究專家，學識淵博，學養深厚，「二學」集於一身，從此成了標誌。他家客廳牆上，懸掛兩幅字條，一幅是周策縱寫的，另一條出自馮其庸手筆。兩位學者都是當今專攻紅學的權威，興味相投可見一斑。因感於潘銘燊寂寞斗室年餘，此際該是讓更多人認識他的時候了。三月十一晚，特別造訪他的書室「學書樓」，錄音聊天，閒話家常，不覺午夜已屆，彼此均無倦意。回家後，再花時間整理，我們的對話由《紅樓夢》開始，文中分用■□兩個符號代表，黑的是我，白的是他—作者附誌。

■我如今登臨「學書樓」，潘銘燊，談什麼好？講《紅樓夢》？

□題目這麼大！不好吧？（兩人同時開懷大笑）不過，用《紅樓夢》作這次對話的引子也很不錯。

■《紅樓夢》是中國文人雅士學者，一致公認的偉大的現實主義文學傑作，是思想性和藝術性，互相結合的中國古典文學的頂峰。二百多年裏中國文學的名篇佳作極多，但沒一本能超越《紅樓夢》。我是受了朋友的影響，發奮閱讀這本名著的。少年時代不識愁滋味，讀來囫圇吞棗，沒能領會書中的義蘊。年紀大了，再讀的時候，感受良多，受它的影響也很深，特別是書中的詩詞。你認爲，《紅樓夢》最出色的地方在那裏？

□詩當然是《紅樓夢》成功的表現手法，傳說曹雪芹是以小說傳詩的。但作爲《紅樓夢》的讀者，我以爲，小說裏的對話描寫是最成功的。對於讀過《紅樓夢》的讀者來說，幾乎每一句對話都是熟悉的。作者在小說裏所提煉的人物語言的個性化，水準非常高。不同的人物所講的說話，用詞造句也緊隨各自的性格身份而互爲不同，這是很難處理的。

■我雖然很喜歡曹雪芹的詩，事實上却是林黛玉，探春，寶釵等人寫的，反而不覺得是作者的手筆。至於它的對話是全書的特色，這是早就公認了的，形象化和生動，更是紅學家研究的對象，好些人甚至以《紅樓夢》的對話，來界定一個人有沒有教養，以《紅樓夢》作爲個人學養的標準。當然，這是不足爲法的，沒有讀過《紅樓夢》的人，同樣很有教養。我提出這一點，目的是證明這本古典文學名著，在中國知識份子階層中所產生的影響，實在太深了。

□你說得很對，中國四大古典文學名著：水滸、西遊、三國、紅樓，民間最流行的是三國和西遊，但在讀書人或者說，知識份子階層中，《紅樓夢》却是最受歡迎的。全中國包括海峽兩岸，我相信，最多人讀過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應當是這本書了。

■你的講法很正確，但我不禁要問，是什麼因素促成這種現象呢？是什麼原因產生了獨立的紅學呢？

□紅學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現象。至於爲什麼《紅樓夢》在中國知識份子階層中那麼受歡迎，因爲它能滿足中國知識份子對閱讀方面的需求。譬如說，五四以後的中國青年，受了封建家長的長期禁制，限制了他們的婚姻自由，或多或少是從《紅樓夢》獲得……。

■靈感？

□倒不妨說是「第六感」。因爲，封建社會講究門登戶對，來自不同階級的青年男女不能結合，所以五四那一代的青年，都站出來反抗。又譬如反清復明的意識，也是或多或少受《紅樓夢》啟發的，這是實質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也的確是因爲《紅樓夢》本身，蘊含着一股非常明顯的特殊魅力，這是其他中外文學名著所少有的。

■我同意你的講法，《紅樓夢》無可否認，蘊含着一股非常明顯的特殊魅力。正如我剛才說過，我很喜歡這部名著裏面的詩，特別是第廿七回最後一段，寶玉在山坡上，聽到一名女子邊哭邊唸詩，虧他省不起這女子正是痴心一片的黛玉。我第二次讀《紅樓夢》，已過四十歲了，一面讀一面替黛玉難過，一面又暗罵寶玉這傻子。像這兩句：「未若錦囊收艷骨，一杯净土掩風流」，這樣的意境，我是一輩子也寫不出來的。至於「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讀完以後更是眼淚盈眶了，感情真豐富！

□對，許多人都承認這個事實，讀《紅樓夢》自年幼讀到青年，自青年讀至老年，每一個階段所引起的感受總不同。每讀一次所產生的感受，總比前一次更深刻。

■我前後讀過兩次了，到我六十歲退休了，如果有機會乘船去歐洲旅行，一定會在海上再讀一次。

□所以許多人都這麼體會到，《紅樓夢》的魅力在於不同階層，不同教育背景，不同人生經驗的讀者，都可以從中獲益，吸取他對人生，對社會的不同程度的啟發。一本文學作品，能獲得這樣不同層次、不同深度的共鳴，各取所需，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極少有的。

■你是什麼時候讀《紅樓夢》的？

□我第一次讀《紅樓夢》是中學時代，講起來完全是機緣和巧合。當時我在香港上課，却住在九龍，每天要乘船渡海。怎樣消磨這段時間？當時我想，讀小說是最理想的方法了，所以就讀《紅樓夢》了。

■當時有什麼感覺？好不好講一下你研究《紅樓夢》的經歷？

□雖然讀得津津有味，但自問那個年紀，是沒能領略其中好處的。以後在英文書院讀大學預科，進了大學以後，選修的課程沒有小說，《紅樓夢》從此放下了，直到我在中文大學教書，前幾年校方分派我教古典小說，我才開始對《紅樓夢》認真探討。研究是談不上，但也寫過不少論文。

■講到紅學，有時我覺得好些紅學家走火入魔，例如根據原著再造大觀園，追查曹雪芹的身世，這已經涉及中國古代建築和替曹雪芹寫家譜的範疇了，甚至連《紅樓夢》的食譜，也有人去研究，真令人莫名其妙，這到底和作爲偉大文學作品的《紅樓夢》有什麼關係？

□我以爲，再造大觀園和研究《紅樓夢》的食譜是不必要的，是不平衡的話，這二百三十幾年裏，總不致於沒有一本的吧？

□我認爲，文學作品是不應當講斤論兩的。你不能說《紅樓夢》重多少斤，別的文學作品缺乏這個重量，就不能和它相比了。文學批評不是這樣的。現代人有現代人評價文學的標準，你總不能要求現代人寫《紅樓夢》的吧！因爲，曹雪芹那個時代，離開我們太遠了。

■我倒以爲一位出色的作家，他的作品能不能超越《紅樓夢》是另一個問題，重要的是，作家必須表現他所處的時代，必須和時代的脈膊相呼應。能够這樣的話，寫出來的作品，即使不能超越《紅樓夢》，也已經具有相當的價值了。

□有一點我要補充一下，文學創作始終離不開才情和學養。

■這點最重要，所以我常常說，野心勃勃的作家，不應當拼了老命去超越《紅樓夢》（大笑）！只要忠於自己，努力寫作就行了。

□這是必然的，像曹雪芹這樣的天才，不是經常出現的。

■再回過來講講別的吧，以加華作協爲例，經過六七年的沉默耕耘，現在總算讓外界知道我們的存在了。在這麼一個推動文化工作相當困難的環境裏，你怎麼會和朋友組織楓橋出版社的呢？是不是也像我們一樣，尋求文化工作的突破？

□很多朋友也說，在海外搞華文文學是異常困難的。其實，也很難要求華裔的子弟接受華文文學，他們受西方文化薰陶，這要求是大一點了。不過，我們此刻正面臨一個新契機，即是說，相當大量的中國人，從香港、台灣移民到加拿大。對這些華人來說，和他們的根保持聯繫，精神生活自然比較豐富。他們是新移民，一下子不能完全投入，適應新社會，要割斷他們以往的文化淵源，是相當難過的。在這時候向他們提供中國文化的食糧，讓他們感受到根的寄託，是很值得高興的。

■換句話說，楓橋出版社的目的，是造就尋根的機會？

□可以這麼講，特別是在加拿大，日漸落實多元文化政策的優越條件下，華人的子弟可以自己選擇，西方呢還是中國呢？如果他們選擇中國文化作爲養料，這恰好是我們所面臨的契機。因此，不管是加華作協，或者楓橋出版社，我們是有這個在海外發揚中國文化的機會的。

■你和朋友創辦楓橋出版社，照你估計，條件成熟嗎？

□我們沒有做過市場調查，更沒有調查過加拿大華人社區中文讀者的需要和品味，只抱着一種信念打開局面。至於我們所出版的書有沒有需要？有沒有讀者購買？有沒有人閱讀？出版社能不能長期維持下去？那就不是我所能預料的了。我和我的朋友，只能抱着中國傳統讀書人所說的，不可爲而爲之的信念幹下去。不可爲尚且要爲下去，既然不能肯定不可爲，就可能是有可爲了，爲什麼不試一試？

■你比我幸運一點，最近兩三年裏，新移民增多了，中文閱讀的風氣，也相應地濃厚了，所以你比我幸運。十年前，這裏缺乏散播華文文學的土壤。一九七三年我初來的時候，只有我一個人孤軍作戰。不單寂寞，更平添一股慘遭遺棄的感覺。

□加拿大落實多元文化政策，是近六七年的事吧！

■訂下這個國策，已經相當時日了，杜魯多時代已經推行了，落實政策却是近幾年的事。

□我們盼望能充份利用民主運作的方式，將出版社搞上去，比我們所預期的更理想更完美。■

鷓鴣天

■羅伉烈

得敏之兄來玉並賞花篇却寄

地坼天崩血肉飛，曾張筆陣一戒衣。羞同社鼠安巢穴，更逐青蠅營是非。甘縮手，好居夷，故園今夕賞花時。天涯賸得看花眼，恨望東風第一枝。

作者簡介：羅杭烈教授原在香港大學教授詞學，今兼澳門東亞大學客座教授，是著名的詞學專家。

《加華文學》
No. 6
■雙週刊
■主編
■加拿大華裔寫作人協會
通訊處■
CHINESE CANADIAN WRITERS' ASSOCIATION,
P.O. BOX 72, NEW WESTMINSTER,
B.C. V3L 4X9

回返

■湯潮

星星是夜的失眠
河床捧起鵝卵石朝天祭獻
受傷的獵人
沿着血的杜鵑
我怎麼能够
回溯我的歸程？

水化作飄逸的彌漫
億萬地撲向每一個空靈
沉思多麼美好
陷入夜就象陷入無限
我無法忘記你仙人掌的花瓣
訴說的纖維織出淚的星光
還有南雁的長鳴
汽笛般俗留欲斷

白日令人遠惆
仿佛磁帶上的留音
聲音的排列如種族的基因
自由在旋轉中空洞地釋放

理解的在理解中存在
只有忘却才能封閉黑暗
你是過去
是林間彎延的回想
我是未來
是河岸高聳的瞻望
一切現時的都不可珍藏

愛情多像天空
離我們最近
也最遠

房子

■老成

溫哥華的氣候與我們廣東老家的有相近之處，一年四季雨量都很多。每逢括風下雨，我便要想起遠在家鄉的老母。去年初就聽說母親租住的房子爲鄰火禍及，燒去房頂，但直至今日仍沒有人去修整。據說是因爲房子歸屬問題還未搞清楚。原來這所房子是五十年代初土地改革的時候，從一個財主手中沒收而來的，政府把它分租給了我們幾户人家。前幾年實行新政策，要把這所房產歸回原主，但一直手續未清，房租却仍是交給政府的。現在起火了，政府大概就想放手了，而原房主自然是不願收拾這殘局，出錢修房子的，於是可憐的母親夾在中間，只有祈求老天少下雨，安然度過一個又一個漫漫長夜了。

一九八二年我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工作，爲住房問題也有一段難忘的經歷。那時我們讀大學全是公費的，國家管吃管住，畢業了理所當然地要聽從國家調遣。我要到的是北京的一家出版社，算很不錯的了，雖然遠離家鄉，雖然臨行前母親眼角的淚花怎麼也無法從記憶中抹去，但好男兒志在四方，所以那時還是興致勃勃，充滿豪情。三天兩夜的火車把我載到了北京，人力車伕再從火車站把行李和我，載到位於北京西區的出版社，我却要發愁了。出版社和我們大學之間不知哪個環節出了差錯，我在檔案裏變了性，變成女的。我被分到一個女宿舍，和幾個女孩同住一間十二平方米的房子。這自然是不成的，但男宿舍裏再沒有空餘的床位，於是我被塞到了附近的一家旅館，行李則堆放在辦公樓的陽台上。

北京難得下一場雨，行李堆在那裏沒問題，我則受苦了。旅館裏四個人共住一間房，那時鄧小平剛上台，開放市場，南來北往跑買賣的人絡繹不絕，我房間的房客一天換幾個，有深夜剛從火車站趕來投棧的，有零晨起床打包趕飛機的。那三個床位從來沒有空過，傳來的鼾聲却夜夜不同。浴室是絕對沒有的，要洗澡可到街上的公共澡堂花錢去洗。一層樓只有一個共用的洗臉間，裏面却是鷄毛鴨血無所不有。就這樣的房間也住不長久。房租每天要八塊錢人民幣，全部由出版社支付，而那時出版社發給我的工資，算來也不過是每天一塊五毛三分。於是不久，出版社管住房的人就告訴我可以搬出旅館了，他們在社內給我安排了住處。那是社內收發信件報紙的房子，有九平方米大，中間一張大長桌，日間用來分檢信報，晚上放上枕頭床單，便是我的床了。白天大樓裏熙熙攘攘，晚上却格外地寧靜，這正是我夢寐以求的，總算有了自己做夢的空間了。但當天晚上問題就來了。原來桌子三面不靠牆，桌子雖比一般辦公桌爲大，却也僅可容身，頭一動，枕頭就掉到地下；腳一動，被子就垂在桌邊，秋天的寒氣就從腳底往被窩裏鑽，更甭提透過床單傳到背脊的硬木板的感覺了。

第二天辦公室主任問起新居的情況，我只好如實說桌子太短了，不足以作床。這個主任是個好人，當時就代我向上頭投訴。下午管房子的人帶着尺子連同上頭領導一起來了，說『這桌子一點也不短，我查過小梁的檔案了，這桌子比他的身高還長兩公分呢！不信你們量量』。我爭辯說一張床不能比身高只長兩公分，旁邊的同事也都支持這觀點。沒辦法，上頭領導會同收發室主任研究，最後同意將桌子移到一個角落，使桌子兩面靠牆，但求枕頭不落地，睡的時候更平添一股慘遭遺棄的感覺。

□加拿大落實多元文化政策，是近六七年的事吧！

■訂下這個國策，已經相當時日了，杜魯多時代已經推行了，落實政策却是近幾年的事。

□我們盼望能充份利用民主運作的方式，將出版社搞上去，比我們所預期的更理想更完美。■

畢業生感興趣，也不以爲意。後來這種情況愈來愈多，而每當我走過去向他們問好的時候，他們又都馬上停止議論，支支吾吾分別離去，回顧的神色也頗特別。我產生了好奇心，一次拉住一位同事問個究竟，她說：『收發室不干净。』就忽忽走了。我大感不解，收發室除了每天收發的幾麻袋信報外，什麼也沒有，地板也常有人打掃，干净得很。一直追問下去，纔知就在我到來之前兩個月，前任收發員在這收發室內服農藥自殺了，屍體就是在桌子底下被發現。那時我是不信鬼神的，但聽後也不禁毛骨聳然。

同事們一再安慰我，說死者是絕對的大好人，老實勤懇，心地善良，好像是爲一些家庭瑣事而看不開自殺的。他與我素未謀面，無冤無仇，絕對不會把我怎麼樣。然而從那以後辦公樓晚間的寧靜不再那麼美好了，風再弓弓身子，被子也不會掉了。但臨走時收發室主任却鄭重吩咐，說收發室重地，每天有中央文件、秘密信函出入，不得亂翻信箱，不得帶閑雜人入室，鎖鑰要格外保管好，以防壞人偷去或檢到，偷看重要文件。我只好莊嚴發誓，事情也就這樣解決了。不久我發現，人們見我進出收發室便竊竊私議。開始我以爲他們對我這個文化大革命以後分來的第一批正牌大學生感興趣，也不以爲意。後來這種情況愈來愈多，而每當我走過去向他們問好的時候，他們又都馬上停止議論，支支吾吾分別離去，回顧的神色也頗特別。我產生了好奇心，一次拉住一位同事問個究竟，她說：『收發室不干净。』就忽忽走了。我大感不解，收發室除了每天收發的幾麻袋信報外，什麼也沒有，地板也常有人打掃，干净得很。一直追問下去，纔知就在我到來之前兩個月，前任收發員在這收發室內服農藥自殺了，屍體就是在桌子底下被發現。那時我是不信鬼神的，但聽後也不禁毛骨聳然。

同事們一再安慰我，說死者是絕對的大好人，老實勤懇，心地善良，好像是爲一些家庭瑣事而看不開自殺的。他與我素未謀面，無冤無仇，絕對不會把我怎麼樣。然而從那以後辦公樓晚間的寧靜不再那麼美好了，風再弓弓身子，被子也不會掉了。但臨走時收發室主任却鄭重吩咐，說收發室重地，每天有中央文件、秘密信函出入，不得亂翻信箱，不得帶閑雜人入室，鎖鑰要格外保管好，以防壞人偷去或檢到，偷看重要文件。我只好莊嚴發誓，事情也就這樣解決了。不久我發現，人們見我進出收發室便竊竊私議。開始我以爲他們對我這個文化大革命以後分來的第一批正牌大學

窗動，夜貓跳樑更常常讓我夢驚魂飛。後來我更知道，新來的收發員即使在白天，也絕對不敢一個人留在收發室。每到收發信件的時間，必有一個不怕鬼的同事陪她一起進去分發信件，分完馬上鎖門離去。有一天，不知是否潛意識作怪，我果然把收發室的鑰匙給丟了，怎麼也找不到，收發室主任半信半疑地追問了半天，然後向人事處長滙報。他們決定馬上換鎖，而我再不能住進去了，真是謝天謝地。正好那時有個男同事出國公費留學，騰出了後樓男單身宿舍一個床位，我便搬進去了。這單身宿舍裏也有許多妙處，且聽下回分解。■